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Major Series Reports on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MOE Serial Reports on Development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1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
增长研究中心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4

ISBN 978-7-80234-640-6

I. ①中… II. ①北… III. ①经济增长—研究报告—
中国—2011 ②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 IV. ①F12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559 号

书 名：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1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7-80234-640-6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 × 1000mm 1/16

印 张：21. 25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 00 元

联系电 话：(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 邮 件：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目 录

| | |
|--|----|
| 绪论 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变发展方式 | 1 |
| 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 1 |
| 二、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优势 | 4 |
| 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 |
| 微观上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 7 |
| 四、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 |
| 宏观上经济调控方式的变化 | 10 |
| | |
| 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 15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国际比较 | 16 |
| 第二节 中国式现代化与“三步走”发展战略 | 20 |
| 一、GDP 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特殊意义 | 20 |
| 二、改革开放后各个历史时期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表述 | 22 |

| | |
|--|-----------|
| 三、“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 | 25 |
| 第三节 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国际对比 | 29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动态比较 | 36 |
| | |
| 第二章 GDP 的作用和局限性 | 43 |
| 第一节 GDP 的作用 | 44 |
| 一、GDP 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 | 44 |
| 二、GDP 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 和重要依据 | 45 |
| 三、GDP 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 47 |
| 四、GDP 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 | 47 |
| 第二节 GDP 的局限性 | 47 |
| 一、GDP 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 | 47 |
| 二、GDP 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 | 48 |
| 三、GDP 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 | 49 |
| 四、GDP 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 49 |
| | |
| 第三章 中等收入陷阱与体制创新 | 51 |
|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原因 | 52 |
| 第二节 体制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 54 |
| 一、体制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54 |
| 二、体制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阶段性特点 | 59 |
| 三、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着新的历史性转折 | 63 |

| | |
|----------------------------------|-----|
| 第四章 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使用 | 69 |
| 第一节 增加值结构、就业结构与部门人均收入 | 71 |
| 第二节 地区收入差异与中国经济发展潜力..... | 79 |
| 第三节 宏观收入分配 | 85 |
| 一、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 | 86 |
| 二、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再分配 | 92 |
| 三、对当前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性的基本判断 | 97 |
| 第四节 居民收入分配 | 100 |
| 一、城乡收入差异 | 107 |
| 二、行业收入分配不平衡 | 108 |
| 三、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 | 110 |
| 四、城乡内部收入不平衡 | 113 |
| 第五节 国民收入分配对国内总需求的影响 | 118 |
| 一、资金流量表中各机构部门可支配收入及运用的相互关系 | 118 |
| 二、2004 年和 2008 年资金流量表动态比较 | 120 |
| 第六节 结论 | 122 |
| | |
| 第五章 外向型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 | 131 |
| 第一节 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 132 |
| 第二节 对外贸易的结构变化 | 137 |
| 第三节 主要贸易伙伴 | 141 |
| 一、对外贸易 | 141 |
| 二、出口 | 14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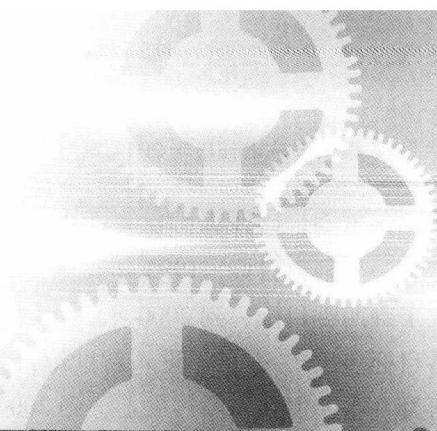
| | |
|---------------------------------------|------------|
| 三、进口 | 144 |
| 第四节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外汇储备 | 146 |
| 第五节 内需和外需 | 151 |
|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 | 152 |
| 二、从投入产出关系看外向型经济和经济增长 | 153 |
| 第六章 住宅市场化改革 | 157 |
| 第一节 住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 161 |
| 第二节 住宅商品化改革后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 | 166 |
| 一、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 | 166 |
| 二、住宅市场化改革后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变化 | 169 |
| 三、当前我国商品房价格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 174 |
| 第三节 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 | 178 |
| 一、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制度因素 | 178 |
| 二、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需求因素 | 179 |
| 三、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供给因素 | 182 |
| 四、房价波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 189 |
| 第四节 在稳定预期的条件下实现房地产业的平稳发展 | 194 |
| 一、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 196 |
| 二、发展租房市场 | 200 |
| 三、货币政策和短期行政干预 | 201 |
| 四、物业税和其他税收政策 | 204 |
| 五、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 208 |
| 六、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 | 209 |

| | |
|--|------------|
| 第七章 扩大内需与消费增长 | 211 |
| 第一节 中国消费增长的主要特点与阶段特征 | 212 |
| 第二节 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 217 |
| 一、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趋势看，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 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 217 |
| 二、收入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人口因素对 消费增长有重大影响 | 218 |
| 三、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城镇化进程对提高消费率有重要促进作用 | 219 |
| 四、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 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 221 |
| 第三节 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 225 |
| 一、我国文化、教育、卫生支出近年增长较快，但其在政府 总支出中的比重并没有明显提升 | 226 |
| 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使得 居民承担的比重上升，突出表现为学杂费比重显著提高 | 227 |
| 三、政府预算内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使得个人 的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提高 | 228 |
| 四、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力度不够，使得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增长 过快，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降低 | 229 |
| 五、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 230 |
| 六、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导致居民的 消费倾向下降 | 230 |
| 第四节 我国居民消费率及政府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 | 231 |

| | |
|--|------------|
| 一、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水平，而且近年下降速度过快 | 232 |
| 二、我国政府消费率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基本相当，但公共服务消费比重明显偏低 | 233 |
| 三、增加政府消费，特别是增加公共服务消费，对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234 |
| 四、提高公共服务投入的均等化程度，保证最低标准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有助于居民增加消费 | 235 |
| 五、增加政府对居民的货币化转移支付，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 | 236 |
| 第五节 扩大消费的主要着力点 | 237 |
| 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 237 |
| 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 239 |
| 三、降低落户门槛和与户籍脱钩并行，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城乡二元结构 | 240 |
| 四、深化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完善资源资产的收益分配制度 | 241 |
| 五、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 242 |
| 六、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核心作用 | 243 |
| 第六节 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范围及变动趋势 | 243 |
| 第八章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形势 | 249 |
| 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后 2010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 250 |

| | |
|---|------------|
| 一、从生产角度看，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二季度 增速放缓 | 250 |
| 二、从需求角度看，上半年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二季度 增速放缓 | 257 |
| 第二节 我国经济增长的近期趋势展望 | 262 |
| 一、2009年经济增速前低后高，影响2010年下半年和 未来的经济走势 | 262 |
| 二、外贸环境复杂变化，外需持续增长的难度加大 | 262 |
| 三、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可能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 | 263 |
| 四、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持续回落，可能影响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回落 | 263 |
| 五、内需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 | 264 |
| 第三节 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 | 265 |
| 一、CPI与食品价格 | 266 |
| 二、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 268 |
| 第九章 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 | 273 |
| 第一节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中国的应对措施 | 275 |
| 一、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 | 275 |
| 二、金融危机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 | 280 |
| 第二节 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选择 | 286 |
| 一、中国实体经济衰退与流动性相对过剩 | 288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的内生扩张 | 289 |
| 三、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与货币供给 | 291 |

| | |
|---|------------|
| 四、当前的货币政策选择及宏观政策组合 | 295 |
| 五、总结..... | 298 |
| 第三节 财税体制的改革与中国财政政策 | 299 |
| 一、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和宏观税负 | 299 |
| 二、财政支出 | 307 |
| 第四节 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 312 |
| 第五节 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及新阶段的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 319 |
|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 | 320 |
| 二、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 323 |
| 参考文献..... | 327 |



绪 论

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变发展方式

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尚未解决温饱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1980 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或称国民总收入 GNI）的排名，在 196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以人均 192 美元列 189 位。而据世界银行 2009 年的排名，在 213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以人均 3620 美元列 124 位^①。从 GDP 增长速度看，2009 年我国 GDP 总量（按可比价格）是 1978 年的 18 倍以上，年均增长 9.79%，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占当年全球 GDP 比重近 7%。2010 年又增长 10.3%，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看，按三年平均汇率方法计算，2009 年世界人均水平为 8751 美元，我国人均 3620 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比 1980 年（按可比价格）提高了近 19 倍，年均增长 10.66%，已经超过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线（3400 美元）。如果按购买力评估法（PPP 方法），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 2009 年人均国民收入为 6710 国际元（美元为主要参照标准），在世界上列第 120 位，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6340 国际元）。

按照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到 20 世纪末实现 GDP 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 1987

^① 数据引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1980 年的中国人均 GNP，和我们当时说的 250 美元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但国际比较时，需要使用统计可比的国际数据。

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 GDP 总量已达到 1980 年的 2.04 倍^①，提前 3 年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目标；1995 年我国 GDP 总量达到 1980 年的 4.33 倍，提前 5 年完成了翻两番目标。到 2000 年，我国 GDP 总量为 1980 年的 6.55 倍，比原定翻两番目标多出 2.55 倍。进入新世纪，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前 10 年翻一番，后 10 年再翻一番。但在实际进展上，到 2007 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目标，2009 年已经达到 2000 年的 2.38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10.1%。在未来的 11 年里，我国只要实现年均 4.82% 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在 2020 年完成较 2000 年翻两番的总量增长目标。从人均 GDP 增长目标来看，党的十七大提出 2020 年实现人均 GDP 比 2000 年翻两番，进入新世纪，我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不到 6‰，到 2001～2009 年我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为 9.55%，2009 年人均 GDP 水平为 2000 年的 2.27 倍。也就是说，在今后 11 年里，我国只要实现年均人均 GDP 5.27% 的增长率，就可以完成这一目标。从经济约束条件上看，在 2020 年之前，我国无论是人均 GDP 增长率达到 5.27%，还是 GDP 总量增长率达到 4.82%，都是完全可能的。从我国所处的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发展阶段特征上看，这一速度并不是十分高。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便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2006 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②，其中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此之后，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率出现回落，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以马来西亚为例，1980 年，它的人均 GDP 在世界上的排名是 84 位，而 2009 年的排序为 89 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此期间，它的人均 GNI 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 5.02%，高于全球 3.01% 的增长率。而与世界加权平均水平相比，1980 年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 2009 年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应该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表现好于世界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和东亚的其他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 GDP 数据核算数据计算，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②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2006.

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相比，它的经济增长率却是偏低的，这也是马来西亚重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如很多拉美国家是国际收支出了问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比，显然是技术创新不足。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府效率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来改进。在很多国家，最初的经济起飞往往是通过政府指导对银行贷款（间接融资），进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进而“寻租”行为普遍发生，私营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府官员中腐败行为的增加，如果制度建设又不能及时跟上，往往会出现政府效率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和一般企业的积极性受挫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出现社会动荡，也就是说当资源的配置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其效应自然难以保障，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注重制度建设，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利益集团，注重惩处和清除腐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如新加坡、香港特区和韩国都很注重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即最初的加速经济增长，都是依靠在短期内增加投入和产出形成的，但是劳动力和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投入。新加坡、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和它们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研究开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出卖资源而不注重研究开发以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的增长就只能依靠加大资源的开发量，或者寄希望于资源价格的提升，这种发展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经济发展失衡包括收入分配失衡、地区发展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等。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在经济起飞初期，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优先获得发展以及积累率的迅速提高，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经济发展就会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即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获得发展、城乡差距缩小、中低收入居民家庭明显改善等。如果在这时有科学合理的政府干预和制度安排，形成这种新均衡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否则很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他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

第四是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对外部的资源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没有及时对自身的资金结构、市场结构等加以调整，这样，外部世界的动荡和风险往往严重地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一些拉美国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就一直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这和它们外资结构不合理、又没有适时地进行调整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过分单一，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过大，国际市场一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受到严重冲击。

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中国也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经济长期徘徊或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各个方面（如社会、能源、环境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但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我们能较好地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中国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

二、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优势

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工业化率显示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即工业化尚未完成，但已进入由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向重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革命深化的阶段。据测算，我国京、沪、津三个城市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工业化率达 100%），其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已进入后期（工业化率一般在 70% 以上），而西部部分落后地区工业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工业化率一般在 50% 以下，甚至有的地区仅为 30% 左右），其他地区则在工业化中期。

全国加权平均所得工业化率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①。从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是高速增长期，这一高速增长期的长短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但一般说来，越是大国这一时期相对越长，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更艰巨；越是先发展的国家这一时期相对越久，因为缺少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相当于国际社会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一系列目标，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当于国际社会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在未来10~20年里在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前后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的中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均具有较高的增长动力，若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红利”，这种需求动力就更为强劲。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成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

其次，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2009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我国城市化率仅为46%略强。同时，我国这46%的城市化中还包含1亿多进城民工，而进城民工虽然离开农村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并以务工收入为生进城，但其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水平与真正的市民有很大差距，这表明我国城市化率不仅规模低，而且质量水平也不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城市化率水平低的同时，城乡差距悬殊。从收入水平上看，据统计我国目前平均每个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而农村居民家庭同时又是生产者，其收入能够用于消费的部分就更少。据估算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不到市民平均水平的1/4。换句话说，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以上人口的人口大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不到总人口50%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拉动，而50%以上的人口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不能不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严重扭曲，其可持续性受到极大的局限。因此，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

^① 参见：刘伟，张辉，黄泽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载《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

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进程，已进入加速期，一般说来，城市化率达到30%~70%之间是加速发展时期。我国不仅城市化规模提升空间巨大，而且城市化质量改善的空间更大，在改善和完备现代城市的功能过程中，必然要求在体制上加快市场化，很难想象脱离较完备的市场机制能够发展起现代城市，现代城市是市场机制功能上的集合；必然要求在产业结构上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现代工业制造业基础上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果说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决定了城市的规模，那么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主要决定着现代城市的质量；等等。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都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条件，因此，城市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不仅使更多的农村人口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现代生活，从而创造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而且使经济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从传统方式转入现代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这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

其三，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既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低的表现，同时也是支持我国可以更持续地保持高速增长的因素。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上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如果说以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推动力，那么伴随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增长拐点（比如通常所说的当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后），西部和中部却可能恰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外，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着高速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着经济增长的效率。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先后批复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天津滨海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陕甘关中——天水经济区、黄河三角洲、中国图们江区域、横琴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海南旅游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江苏沿海城市带、辽宁沿海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等20多个国家级地方发展战略规划，这种区域性增长极的批次涌现不仅提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均衡性，而且推动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